

理论动态524

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

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

1984年10月10日

从感情上来一个转变

——四论彻底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

深入开展彻底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教育，不但要从理论上、思想上解决问题，还必须从感情上解决问题。

感情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一种反映。感情一旦形成，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对某一事物以及与之有关的事物的态度。“文化大革命”这场内乱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，它历时十年之久，因而不能不在人们的感情上打上深刻的烙印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由于人们的地位不同、处境不同、经历不同，对待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感情也各异，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人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前期、中期和后期，感情也往往有所不同。对有些同志来说，经过拨乱反正，虽然从理论上、认识上澄清了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一些错误看法，可是恐怕还不能说，在感情上也已经与“文化大革命”划清了界限。人们对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感情态度、感情联系，常常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渗透出来、表现出来。比方

说，一些同志当年是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参加“文化大革命”的，所以一提“彻底否定‘文化大革命’”，就感到心里有些不大舒服；还有些同志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入了党，得到提拔，就容易对彻底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产生某种抵触情绪；另外一些同志至今还保持着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形成的派性感情，在对待和处理各种问题，亲一些人，疏一些人，甚至仍在搞派性活动，等等。一个人的感情固然是伴随着人的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形成的，但一旦形成之后，又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相对独立性。所以，对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理性的批判并不能完全代替感情上的转变。感情作为一种心理活动，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，但却经常在起作用，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。前面提到的情况告诉我们，正是那样一些感情方面的原因，仍在继续给党的工作、给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带来各种干扰和危害。因此，要彻底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就必须从感情上来一次转变。

为了彻底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有哪些感情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呢？

一是朴素的阶级感情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而被卷入运动的。现在看来，这种信赖的基础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。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就其本身来说是可贵的、值得珍视的，但是感情本身并不能形成明确的思想，仅仅凭着这种感情并不能明辨是非。由于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没有同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结合起来，因而具有相当大的狭隘性和局限性，所以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，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思想上的迷信与行动上的盲从。

这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第一，我国是一个封建历史悠久的国家，长期的封建主义的遗毒并未肃清，党内的民主生活不正常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很不完善，因此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的那种政治气氛中，朴素的阶级感情就形成了一种狂热的个人崇拜的感情，并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陷入一种盲目的行动；第二，囿于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，人们对于毛泽东同志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一系列“左”倾错误论点缺乏理论上的辨别能力，以至盲目信奉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”；第三，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的一段时间，朴素的阶级感情又使人们很容易地接受了华国锋同志提出的“两个凡是”的错误方针。事实证明，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，很难发现和抵制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错误。所以，我们在总结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教训时，应当对于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采取实事求是、科学分析的态度。朴素的阶级感情，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良好基础。但是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实践说明，如果停留于朴素的阶级感情，而不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，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。这可能是许多人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。

二是派性感情。

派性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最顽固的后遗症之一。经过拨乱反正，广大党员和干部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派性，增强了党性，但在少数人中间，派性仍然存在，有的还比较明显。派性之所以十分顽固，是因为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长期派仗中产生和形成了一种派性感情。现在公开鼓吹派性的人是很少了，但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派性感情却仍在起作用。譬如，同志相处，有亲有疏，原属同一派的，好说话，好办事，甚至党的会议内容、重要的组织决定也可以私下泄露，而对原来的“对立面”，则冷若冰霜、处处找别扭，以

至在工作中彼此安钉子，互相设埋伏；别人来外调原来同一派组织人员的情况时，采取“避而不见，见而不谈，谈而不写，写而不实”的态度和做法，把包庇错误看成是保护“战友”；有的领导者出于派的感情，对于仍旧闹派性、结帮营私、利用派性搞不正当活动的人不批评、不斗争，反而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之大开方便之门、创造种种条件，一些“三种人”往往因此得以继续为非作歹，有恃无恐；特别是在调整领导班子、选拔干部、清理“三种人”以及落实政策、调整工资、评定职称、分配住房等问题上，维护同一派人的利益的倾向就表现得更为突出。这种派性感情同党性原则是不相容的，它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，给党的事业造成的麻烦、带来的损失是不能低估的。

派性感情长期以来难以消除，除了由于对派性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外，与那种认为自己一派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“一贯正确”的观点直接有关。有些人虽然也抽象地否定派性，但对于自己一派的所作所为却总是给予具体的肯定。其实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各派造反组织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区别，但从根本上说，都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产物，是夺权斗争、揪斗“走资派”的直接结果。它们行动的理论基础都是所谓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”，它们斗争的对象也都是所谓“党内走资派”。因此，在我们看来，不存在哪一派正确，哪一派错误的问题，它们都不过是“文化大革命”这场内乱所孕育的畸形儿。所以，为了克服和消除派性感情，首先就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对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派组织产生的社会背景、历史条件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进行具体分析。在个别人、个别问题上比对错、争胜负，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。

派性感情在今天顽固存在，说穿了，是某些人企图继续维护，

争夺包括自己在内的派的利益的反映。在选拔第三梯队、清查“三种人”等问题上，派性感情往往较之平时更容易暴露出来，就是因为如此。《党章》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“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，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”，而派性感情则使人们用派的利益（常常是某一派中少数人的利益）去取代党和人民的利益。因而，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，就必须坚决抛弃派的私利，与派性感情决裂。

至于那些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入了党的同志，在彻底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有些委屈情绪，这也是不必要的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入党的人有各种情况，要做具体分析。其中多数人本质是好的，是要求进步的，混入党内的“三种人”和其他坏人毕竟是少数。但是，另一方面也要承认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气氛中，自己多少都受到了“左”的影响。现在回过头来，检查一下当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，这对于进一步肃清“文化大革命”“左”的流毒、增强党性，做一个合格党员，是十分必要的。

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指出：“他们两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，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。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这种直接的政治情感，同时对于政治专横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有深刻的理论的认识，并且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，所以他们正是在政治方面异常敏感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1卷第41页）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身上，强烈的政治情感是与“深刻的理论的认识”和“丰富的生活经验”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。作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，一方面，决不能满足于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，还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，使两者在自己身上统一起来；另一方面，还必须以共产党人的党性，

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，自觉地克服自己身上的不健康的感情。这样，才能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，并保证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、路线、政策的贯彻实施。